

張羣與戰後中日關係

● 陳鵬仁（大學教授・日本問題專家）

不念舊惡以德報怨

張羣，字岳軍，民前二十三年（一八八九年）五月九日（農曆四月十日）出生於四川省華陽縣。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四日病逝，享年一百零三歲。一九〇八年春季，張羣由清廷陸軍部保送赴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同行者六十人，故總統蔣中正總統也是其中之一。旋即參加中國同盟會。振武學校畢業後，以士官（日人稱為士官，實即軍官）候補生身分，分發新潟高田第十三師團野砲兵第十九聯隊實習，與蔣中正同一聯隊。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遂與蔣中正和另一位同學陳星樞不假離隊，密往長崎，乘輪回國，投身革命。一九一三年，討袁世凱軍事失敗，張羣偕夫人及其他同志前往日本，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班十期砲兵科深造，兩年後畢業。自此以後，張羣與日本結了不解之緣。終身為蔣中正總統最信任的左右手，負責對日政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式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蔣中正委員長發表「抗

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廣播演說」，因希望這是世界的最後一次戰爭，故禁止對日本施以報復，並強調人道：「不念舊惡」、「與人為善」。日人稱其為「以德報怨」政策，也是中華民國對戰敗國日本政策的基本理念。

日本投降，盟軍進駐日本，麥克阿瑟將軍出任盟軍最高統帥；我國為負責商討決定對日管制政策之機構——遠東委員會（設於華府）的一員，在東京派有駐日軍事代表團。一九四八年五月，張羣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八月二十一日，以蔣中正總統代表身分與其夫人訪問日本，九月十三日回國。

訪晤麥帥四度會談

訪日期間，張羣曾與麥克阿瑟會談四次，每次大約兩個小時。八月二十二日第一次會談，他倆談到對中共的作戰，麥克阿瑟表示中華民國政府絕不能放棄東北和華北，並說很希望與蔣中正總統晤談。

第二次會談於八月三十一日仍在麥帥辦公室。因十天來張羣曾與日本各界領袖晤談，故麥帥

說很願意聽取張氏對日本的觀感和意見。張氏表示，由民主黨、社會黨、國協黨所組織的內閣，因主義、政策不同，很難建立強有力的「中道政治」，下屆大選，自由黨可能獲勝。麥氏同意張氏對三黨聯合政府的看法，但不相信吉田茂所領導的民主自由黨在下屆大選中能操勝券，不過認為，二大政黨交互執政，民主政治始能趨於穩定。麥帥同時表示，他對日本政治不干涉，並認為這是日本人學習民主政治的最好方法和機會；張氏以麥帥採取不干涉政策用意至善，但仍希望麥帥能以其影響力促成日本有力政黨的健全發展，俾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九月八日，第三次會談。由於張氏曾經出遊京都、奈良、大阪、廣島等地，所以在閒談中談到廣島被投下原子彈的問題。對於為何美國選定廣島、長崎為投擲原子彈地點之張氏的疑問，麥帥答說：「長崎本非第二目標。初擬炸九州東北部鋼鐵廠，因當時氣候不佳，陰雲密布，飛機無法飛入，遂轉移目標，改投長崎。至於廣島由空中最易飛進，目標顯明；同時航空母艦駛駐地點最為安全，故首先被炸。至於未在東京投原子彈



①張群（中）訪日出席自民黨議員福田俊一晚宴時留影。

②1971年張群（中）訪日與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右）及首相佐藤榮作左合影。



的原因，由於東京木造房屋佔百分之七十，投擲小型燒夷彈，即遭焚燬，風行速度平均每小時二十英里。由東京至橫濱一帶，會燃燒三十天，工廠中心，焚燬殆盡。」麥帥對廣島、長崎兩地所以被投擲原子彈的說明，確為人們所不知道的秘密史實。

對於日本民主制度的建立，張氏向麥帥提出四點意見：(一)必須沖淡日本人對「天皇神授」的神權思想；(二)要重視裕仁的遜位問題；(三)神道思想和武士精神，似在日漸恢復，應提高警覺；(四)要使不左不右的中間人物在政治上立於不敗之地，以建立和鞏固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基礎。

九月十日第四次會談，主要談經濟問題和共黨問題。首先，張氏提出：在遠東，設法防止共黨勢力之擴張乃是盟國的首要問題，管制日本是次要問題；張氏同時讚佩麥帥曾公開坦率批評美國政府的「重歐輕亞」政策。麥帥非常關心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的軍事情勢，他明白指出：「中國內政改革，雖極重要，但目前軍事問題仍居首位。戰事如不解決，改革無從著手，以故，目前軍事援華，最為重要。」

關於共黨問題，麥帥認為目前蘇聯的世界策略是，在歐洲採取守勢，無餘力再西進；但在亞洲卻出於積極攻勢。它慫恿中共、韓共南侵，並由印度插足南洋，以完成大包围態勢，因為蘇聯深知亞洲資源豐富，今後將是亞洲及太平洋時代。麥帥主張中國不可放棄東北和華北，繼續剿共，相信中國政府必能粉碎敵人陰謀，戡平叛亂。

關於經濟問題，日本目前仍需依靠美國的糧

食援助，年需三、四億美元；日本經濟之復興，因工資過高，商船損失太多，運費昂貴，缺乏原料，故三、四年之內，決不能自給。

對於今後世界經濟與亞洲的關係，麥帥強調：往後一千年，世界經濟將以亞洲為中心。亞洲是世界最大而資源尚未開發的地區，其人口有十億以上，生活程度最低，亞洲人如能自己開發資源，自己生產商品，統一自成亞洲人之經濟圈，其前途必大有可為。在此經濟圈，日本是一個關鍵性的國家。「今後二十五年，大可利用日本，以彌補亞洲經濟上之缺陷。日本終係東方問題，美國終將離開日本。中國若不急謀與日本善處之道，在此亞洲經濟圈中，中國將為一犧牲者。歐美將視日本為東方貿易之基礎。」麥帥所說，經過四十多年後的今日，竟一一應驗。其高瞻遠矚，實在令人欽佩。

張羣結束為期三週的訪問日本，離日返國之際，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對日本記者的訪問，就戰後日本經濟、政治和思想趨向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日本戰後經濟建設，不應該像目前這樣，只是為了少數特殊階級的利益，而應該為一般人著想；特別是如仍以日本為工業國家，其餘國家均淪為農業國家，這既不合理，也不可能。

二、日本的政治，不應該像目前這樣，只是形式上、條理上和口號上的改變，而應該是實質上的改變。

三、日本人的思想，不應該永遠圈在封建君權神道的圈子裡，而應該厲行思想革命和心理建

設。換言之，就是應該關於對日和約問題，張羣表示：中國必本其希望早日召開和會之一貫主張，與有關國家協議，努力於其早日實現。

中日和約締結原則

盟國對日和約之洽商，始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初，韓戰爆發（六月二十五日）之前，該項和約，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訂於舊金山。而中日和平條約則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開始商談，在盟國對日和約生效前七小時半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簽字於臺北，並於八月五日生效。

中日和平條約商談之所以遲滯的原因，一方面必須等待盟國對日和約內容的決定，以為參考；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當時的國際情勢所造成。因韓戰已經爆發，美國政府固然重視臺灣在西太平洋上的戰略地位，但又恐怕刺激中共，使其參加韓戰，拖延戰爭，因而杜魯門總統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以臺灣地位為主題發表三點聲明：一、韓戰結束後，第七艦隊即撤離臺灣海峽；二、臺灣問題俟對日和約時解決；三、希望中共勿參加韓戰。杜魯門之所以發表這樣的聲明，乃由於受到英國的壓力、中共的威脅和美國本身力量之不足所致。

對於中日雙邊和約的簽訂，張羣是參與其事的最重要人士之一，在簽訂過程中，舉凡遇到雙方意見對立甚至衝突時，幾乎完全由張羣出面協調，故中日和平條約之簽訂，張羣的功勞至大。張羣認為，中日和約之所以能夠順利簽成，「第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儘管我國政府已播遷來臺，



① 張群（右二）會見日本裕仁天皇（右），左二為皇后，左為皇太子。

② 一九六七年張群（左）在機場迎接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夫婦。



但日本以及美國卻不敢忽視蔣中正總統的威望；第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堅強反共立場。」（按當時杜勒斯是杜魯門總統的特使亦是國務卿）談判中日和約之初，我方提出和約初稿一共二十二條，但經過討論和協商，最後定案簽字時為十四條，加上議定書、照會第一號、照會第二號和同意記錄。

對於中日和約的締結，我國政府始終堅持以下兩個原則，要求日本政府必須予以尊重：

一、中華民國政府為代表全中國主權之政府，為對日作戰盟國之一員，日本自不得視為『地方政權』，蔑視其國際地位。

二、中日和約，名實均應以舊金山和約為藍本，為一適應於中華民國全面之和約，日本不得主張為一有程度之條約。」

由於當時中共已經盤據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實際上只及於臺灣和金馬，因此在對日和約的談判過程中，和約之「適用範圍」遂成為最大的爭議問題。

吉田（茂）書翰就這個問題詮釋說：「（和約）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但中華民國政府卻認為，「或」字有兩者選一的意思，故希望在條約中將其改為「及」字，而與日方針鋒對立。最後雙方同意以同意紀錄載明「或」字可解釋為「及」字。

締結對日和約兩個多月之後，即於一九五二年七月，我國首席代表葉公超外交部長在立法院就這個問題說明道：「該換文所定範圍，為我政

府控制下之全部領土，所謂控制，乃屬一種事實上之狀態，並無任何法律意義，與法律上之主權，截然不同。……又該換文中所稱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一語中之「或」字，曾一度為雙方全權所討論之問題，因此討論之結果，而有同意紀錄第一節之規定，即「或將來在其……」字樣，可認為具有『及將來在其……』之意。……因此依照該換文之規定，將來中日和約適用之範圍，為將來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之全部領土，即臺灣省及中國大陸，亦即中國全部領土。」

而對於這個爭議的解決，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前面提到的所謂「吉田書翰」，與中日和約之簽訂具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當時中共已佔據大陸，共產集團國家乃至於英國都主張由中共代表中國參加盟國對日和約，因美國堅決支持由中華民國政府參加，結果雙方都未能參加盟國的對日和約；同時美英兩國政府代表會談同意：究竟要與中華民國政府或者中共政權締結雙邊和約，應由獨立以後的日本自行決定。

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事後表示，那時他的想法是，雖然願意與「臺灣」維持友好關係和加深經濟關係，但卻不希望因與國民政府的關係太過密切而否認北京之中共政權，而甚至於說國民政府是「地方政府」。不過當時韓戰如火如荼，聯合國大會通過中共為侵略者，即聯合國和中共可以說是在交戰狀態，同時中共與蘇俄所簽訂的同盟條約，係以日本為其共同的假想敵國，加以美

國參議院要日本事先表明將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雙邊和約，否則舊金山和約在美國參議院殊難獲得批准。

面對此種情況，吉田茂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寫信給杜勒斯，表明「日本無意與中共締結雙邊條約」，並保證「日本將遵照舊金山和約之各項原則，願意與國民政府恢復正常關係」；同時表示：「這個雙邊條約之規定，適用於現在國民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

對於吉田書翰，杜勒斯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覆吉田函說，因為貴翰對於中國問題明確的表示，貴首相所耿耿心對於對日和約及美日安全條約的批准所做討論，因沒顧慮到前後關係及其背景所可能引起的誤會，將為之完全消除，同時對吉田首相勇敢而果斷的態度表示敬意。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在華盛頓和東京同時發表了吉田書翰。二月十六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根據吉田書翰，建議美國參議院批准簽訂於舊金山的對日和約，參議院遂於三月二十日正式批准該項和約。

但根據一九七八年四月，美國政府所開放國務院外交文書一九五一年「亞洲、太平洋」史料，吉田書翰是杜勒斯助理起草，經由吉田首相所發出去的。

張羣之強調中日和約所以終於能夠簽成，杜勒斯的「堅強反共立場」是第二個重要因素，由此得到印證。

又，簽訂對日和約的我方首席代表，如前面



①張群（中）偕蔣經國（左）接見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夫人
 ②一九二七年九月張群（右）隨蔣介石將軍（中）在上海
 接見日本來華記者。



說過，是外交部長葉公超；日方首度代表為河田烈（Isao Kawada）。河田曾任內閣書記官長（相當於我國行政院秘書長，但不是閣員）和大藏大臣（相當於我國的財政部長），是吉田茂的表弟。

中日和約在立法院通過後的第三天，一九五一年八月二日，張羣以蔣中正總統特使身分訪問日本。這是因為兩個月以前，吉田內閣為策進兩國關係，曾派前國務大臣緒方竹虎（自由黨總裁）為特使訪問我國，所以張羣此次訪日是報聘前次緒方竹虎之訪華。

張羣因此首先造訪緒方，拜訪吉田首相。與吉田就政治（共黨）、經濟問題交換意見，長達三小時之久。此次在日本，張羣本不準備多逗留，惟因日本朋友一再挽留，後來又因為董顯光被任命為中日和約後首任大使，董顯光既不諳日語，又與日本無甚淵源，故堅邀張羣多住些時日，以協助他打開局面，老友盛情難卻，張羣遂逗留三個月之久，為戰後張羣住在日本時日最長的一次。

此次訪日，張羣首次會見昭和天皇。從此以後，張羣曾會見昭和天皇五次。昭和天皇給他的印象是：「一位誠篤的學者，談吐也極為謙和。」張羣自我介紹說，他四十五年前曾留學日本，爾後服膺孫中山先生的遺教，致力於中日兩國的親善工作，以迄於今。

昭和天皇面帶愧色說：「雖經閣下長時間的努力，而兩國終於兵戎相見，誠屬遺憾，深覺無以對閣下！」

昭和天皇感激中國

昭和天皇接著又說：「蔣中正總統在終戰時聲明以德報怨，此種寬大精神，至今令人感激，由於蔣總統的這種精神，本次的和平條約才賴以完成。」對張羣答說：「蔣中正總統的聲明，是深望藉戰事的結束，能從此解消過去長達數十年的兩國間的芥蒂，而重新建立真正親善互助合作的友誼。聲明發表之後，已承貴國人民熱烈感謝，現在又蒙陛下親口言謝，本人自當轉達我總統。我總統一定會覺得很欣慰。此次戰爭的責任，蔣介石總統早就深知是部份軍人之所為，與陛下的意旨及人民的願望相違，因此在開羅會議時，曾強調盟國應該尊重日本皇室。」昭和天皇聽了張羣這番話，而悚然說：「吾人對蔣介石總統的盛意，真不勝感謝。」

張羣與昭和天皇這番對話，實在非常珍貴，值得我們大書特書，更應該讓更多的日本人知道這個事實。

爾後，張羣或以蔣中正總統特使及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顧問的身分，又訪問了日本六次。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張氏再以蔣總統的身分往訪日本。此時的首相是岸信介。從吉田茂至岸信介。其間還經過了鳩山一郎和石橋湛山。張羣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訪日，是報聘六月間日首相岸信介之訪華。此次訪問，張羣前後作了二十次以上的講話，五次以上的廣播和電視對談，在東京、大阪和札幌三地正式舉行記者招待會，並在機場和各種場合隨時接見記者，答復

問題。

張羣在各演講和談話中所表示的意見歸納如下：（一）重申中日兩國必須合作，共同抵抗共黨侵略，實現真正和平；（二）主張中、美、日三國密切合作，以建立亞洲集團安全體制及區域經濟合作；（三）顯示我光復大陸的準備和決心；（四）揭露中共內部混亂及走向崩潰真相；（五）分析與共產國家和平共存的危險性，並闡揚蔣中正新著「蘇俄在中國」的要旨和真諦；（六）闡釋政治、經濟、文化三者具有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關係，與中共經濟來往，有導致政治滲透的危險；（七）說明日本與中共貿易之「得不償失」，日本商品的正常出路在於與亞洲自由國家從事經濟合作，今日日本的繁榮是與民主國家合作的結果；（八）闡明近年來中日兩國經濟關係的進展情況，及此後擴大發展的可能性；（九）說明中日文化相同，其交流為自然的現象，今日所以發生障礙，乃因為雙方政治思想未能完全一致所造成，故必先除去政治上歧見，始能促進文化的交流；（十）對於華僑，除代表蔣中正總統深致慰問之意外，希望他們共同努力於反共復國的工作和遵守僑居國的法律，並與其政府人民合作。

張羣與岸信介首相會談數次，就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問題交換意見；同行的團員也與日本銀行家和實業家互相討論，認為中日經濟合作，尤其臺灣之經濟建設，如能獲得日本之工業設備，則可以加速完成當時我國之四年經濟計畫。為臺灣經濟之資金，日方當即決定派遣日本輸出入銀行計劃部長前往臺灣考察，以研究和商談有關



①張群（右二）陪吉田茂（右）參觀故宮文物，左為故宮副院長何聯奎。

②張群（左）、黃朝琴（右二）、岸信介（右）在日月潭留影。



臺灣貸款的分期付款問題。張羣此行，收穫甚豐。

發生三項不快事件

從這個時候到中日斷交之前，中日兩國之間發生了三個不快事件。第一件是岸信介內閣時代的長崎懸掛毛共五星旗事件；第二件是池田（勇人）內閣時代的維尼龍工廠設備售給毛共事件；第三件是周鴻慶事件。

長崎懸掛毛旗事件是於一九五八年五月二日，日本的親共團體「日中友好協會」借用長崎市內一家百貨公司場地，和中共合辦展覽會，為中共宣傳，並掛起毛旗，後來為日本青年扯下，中共提出抗議的事件。

維尼龍工廠設備售毛事件發生於一九六三年，因為池田內閣會議於該年八月二十日，通過以貸款方式，向中共出售一套製造維尼龍工廠整廠設備，其價格為二千萬美元，其中五百萬美元付現款，其餘一千五百萬美元分年付款，年息六分，這座工廠每天可生產三十公噸人造纖維，我國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對中共的經濟援助而提出嚴重抗議。

周鴻慶事件是一九六一年九月間，中共「油壓機械考察團」的翻譯人員周鴻慶，於該團預定離開日本的當天（十月七日）清晨，離團出走意圖亡命但沒成功的事件。

由於這三個事件皆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質，尤其是周鴻慶事件，此時我國政府召回張厲生大使，中日兩國幾乎面臨斷交。為挽救這個局面，池

田首相乃於十月三十日派自民黨副總裁大野伴陸為特使，與自民黨外交調查委員會委員長長船田中和眾議員村上勇，以為蔣中正總統祝壽的名義訪問我國。惟因蔣中正先生對周鴻慶事件非常憤慨，故大野此行未能見到蔣中正先生。

此時，張羣聽取了大野一行的說明之後，即坦率告訴他們：「日本政府所有之表現，都口是心非，行動與言論背道而馳，令人感覺蔑視中國，對中國過於冷淡。」「最要緊者，厥為日本處處給吾人一種印象，令吾人感覺看不起中華民國。此係事實，毋庸爭辯。如欲改正此種印象，今後應以事實證明。」

因此，遂有（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吉田茂的訪華和所謂「吉田書簡」的出現。吉田在臺五日，二月二十四日上午，與張羣會談十五分鐘後，由張羣陪同晉見蔣中正總統，談話兩小時。蔣中正總統聽取吉田的種種辨解之後說：「中日兩國實應互助，共存共榮。故在戰後，非僅設法送還在中國之日本軍民，並曾設法扶助日本，解救日本國家民族之困難，此乃中華民國之傳統精神。……日本係尚義之國家，在重道義之傳統精神，則能以此尚義之傳統精神，不在危難時援助敵人，增加吾人之困難；並對吾人之反攻，予以精神上、道義上之支援。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六年撰著『中國之存亡問題』，主張中、日、美三國聯合起來，保衛太平洋之安定。亦即顯示吾人須團結一致，戒備帝俄，此種傳統精神仍然存在。盼閣下向日本政府轉達，在中國政府困難時，在道義上和精神上予以支援。」吉田表示非常

了解，返日後將代為轉達池田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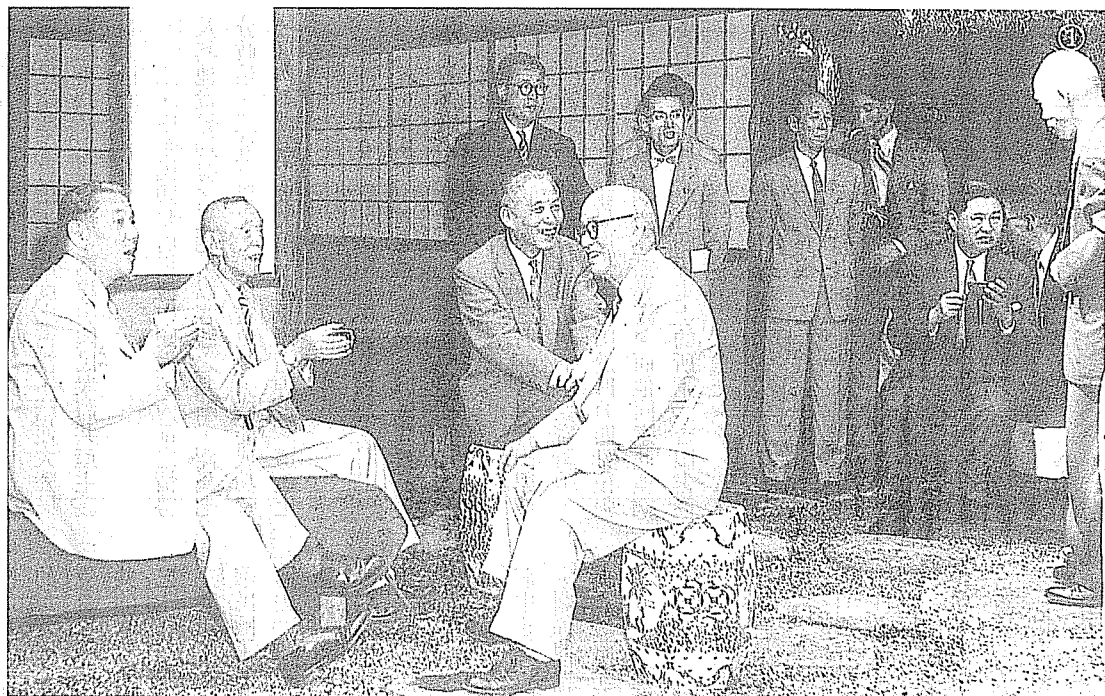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和二十六日上午，吉田三度晉見蔣中正總統於日月潭涵碧樓，蔣總統基於吉田說池田首相實以中日友好關係為日本外交之基本的了解，將連日所談結論告知吉田：「（一）會談中已了解中日兩國利害相關，榮辱與共，雙方必須提攜合作。日本問題即中國問題，中國問題亦即日本問題，中日兩國有不可分之關係。（二）中日兩國既有共存共榮之關係，現中日兩國最迫切問題為大陸中共問題，中國已受其害，日本現正遭威脅，故中日兩國之基本政策為共同反共，雙方應就此問題互相研討。（三）大陸共黨問題乃中國之問題，中國政府將削減共黨，拯救大陸人民，日本自不便參與中國之光復大陸計劃。但日本雖不能共同行動，至少應在道義上、精神上予以支援，不可減消中國之反共力量，不可損害中國反攻大陸之計劃。此點甚為重要。」

吉田書簡專使訪華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吉田臨行之前，又與張羣舉行會談，他倆把這幾天來吉田和蔣總統談話作了一個總結，並將蔣總統覆池田的信交給吉田。這個總結就是「中共對策綱要案」，它包括以下五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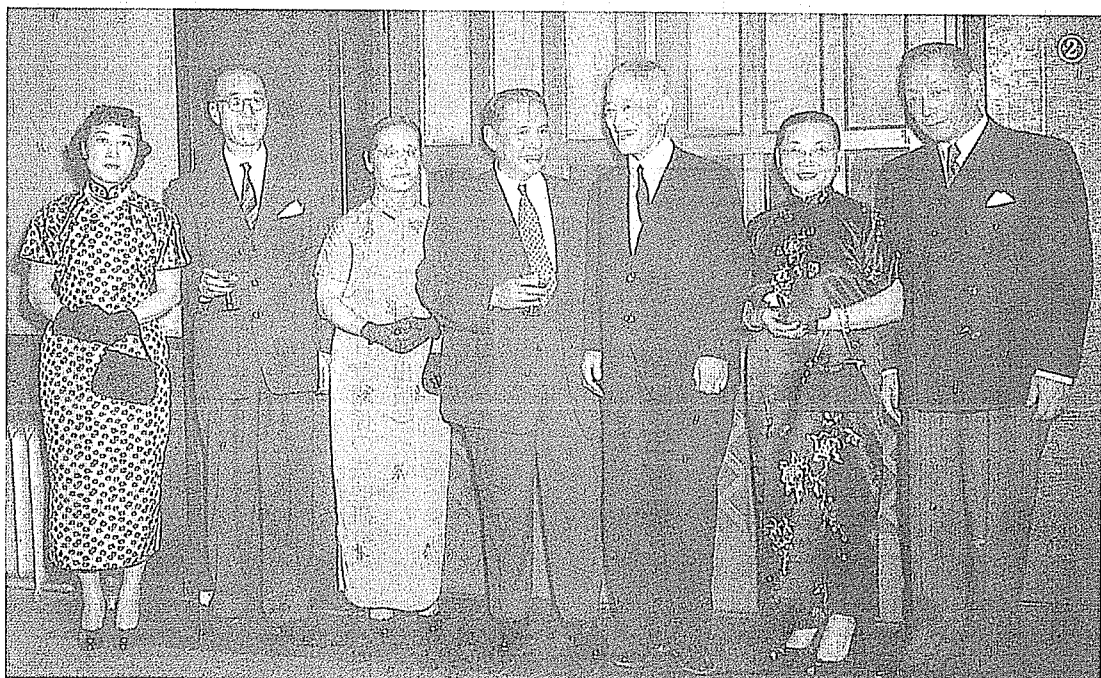
一、欲使大陸六億民眾與自由國家和平共存，並與自由國家擴大貿易，對世界和平與繁榮有所貢獻，必須解放現在共黨主義控制下之中國大陸民眾，使其參加自由國家陣營，至為重要。

二、基於上述之目的，日本、中華民國應具



①張群（左）與中日友人茶敘，右二為汪公紀副團長。

②張群夫婦（中）與董顯光夫婦（右一、右二）、河田烈（右三）、楊竹雲夫婦（左二、左一）合影。



體提攜合作，實現兩國之和平與繁榮，向中國大陸之民衆顯示自由主義制度之楷模，藉使大陸民衆離棄共產主義政權，誘導中國民衆將共產主義自大陸驅逐。

三、中華民國政府根據中國大陸內部之情勢及其他世界局勢之變化，以客觀之判斷，認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大陸反攻政策，確能成功時，日本不反對反攻大陸，並予以精神上、道義上之支持。

四、日本反對所謂兩個中國之構想。

五、日本與中國大陸之貿易，以民間貿易爲限，日本政府之政策，應慎重避免給對中國大陸經濟援助之支持。

吉田回日本後，張羣於三月四日將吉田與蔣總統三次談話的紀錄，以及上述的綱要寄給他，請他「察核存查並見復」。吉田於四月四日復張羣一函說，對那綱要毫無異議。而他同意此項綱要的函件，便是中日關係史上的所謂「吉田書簡」。

吉田說，那份函件係由外務省起草，經由池由首相核定後才由他具名，因此嚴格來說它應該稱之爲池田書簡。就吉田函件，蔣總統曾經說：「吉田書簡是中日和約的補充文書。」

由此可見吉田書簡的重要性。中共因而取消了維尼龍整套工廠設備、貨輪的輸入，以及停止大約二十件大型工廠設備的契約。

狂瀾既倒力挽無功

在中日兩國斷交的前夕，張羣做了他最後一

次的日本訪問。他是以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顧問的身分前往的。前後只有八天。此時美國總統尼克森已經決定要訪問中國大陸；聯合國將討論中共的入會問題；日本人不分上下，瀰漫著「趕搭巴士」的心理，以往對中日合作熱心的新日鐵、三菱重工、東芝等大公司負責人，都逐漸遠離中華民國了。此次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開會，且由過去「政經分離」的原則改爲「不談政治、少談經濟、多談文化」。面對此種情勢，張羣盡了最大努力去說服和挽回，但還是未能「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所以張羣此行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張羣從留學日本到他逝世，七十多年來，在蔣中正總統的提挈下，幾乎「包辦」了中國與日本關係的一切交涉事宜。因此一些日本朋友說「張羣是蔣介石的懷刀」。「蔣介石秘錄」的撰寫人古屋奎二更說：「張羣是中華民國對日政策代名詞」。

張羣不但親自致力於對日工作和中日親善工作，而且爲培育研究日本和對日工作的後進，還創立了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和中日關係研究會。（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的成立也是由張羣促成的）今日，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似乎已經沒有什麼活動了，但中日關係研究會卻日益壯大，並在對日研究和中日親善工作方面繼承張羣的精神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當然這是張羣所樂意見到的。總之，無論如何，中日兩國必須合作，而張羣奮鬥的一生可爲我們的典範和楷模。至於蔣中正總統如何信任張羣，張羣的日記可以爲證。

最後，我要指出日本朝日新聞社所出版「現代人物事典」所刊載有關張羣的錯誤記載。它說張羣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曾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未免錯誤得太離譜了。

參考資料

- 一、張羣「我與日本七十年」
- 二、陳鵬仁著「戰後日本的政黨與政治」「戰後日本思想與政治」
- 三、林金莖戰後日華關係の法的研究（一九八四年，サンケイ出版）
- 四、蔣介石秘錄
- 五、王唯石：張羣傳（中外雜誌二八八、二八九期）
- 六、張羣日記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